

## 黃建中（西元一八八九—一九五九）

方炳林



黃建中先生，字離明，湖北隨縣人。生於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即光緒十五年（西元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先生六歲就讀里塾，十二歲出就外傅，先後入隨縣高等小學、德安府中學、北京明德大學及國立北京大學；民國十年，以鄂省官費，赴英留學，入愛丁堡大學及劍橋大學，研習教育、倫理及哲學。其間民國二年，肄業北京私立明德大學，適章太炎設講學會，先生仰慕名師，潛心聽講，因此得識章氏諸門弟子，而以師禮事黃季剛，使學

問之途有所遵循。民國三年，入國立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哲學門，受瑞安大儒陳介石先生之薰陶獨深，故涉獵經史注疏，並肆力於先秦諸子及宋元明理學，而於浙東之學尤多心得。這可以從先生的著述以及平日講授中，得知先生的學術淵源。

在事功方面，先生先後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兼代常務次長，起草大學專校組織法及規程；湖北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試辦會考，選派留學，擴充公共科學館，創設高級中學、教育學院，特揭「由行而知、由做而學、由勞而獲」為師資訓練原則；民國二十三年再長高等教育司，擬定國防教

育高等部份五年計劃，連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及湖北省第三區立法委員。先後服官七年，參政立法十數載，舉凡有利國計民生與教育建設者，莫不本其良知與學養有所獻替。

雖然先生主持湖北教育行政與全國高等教育，並從事參政立法，但一生事業，仍以講學著述為主。從民國六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受校長蔡子民先生特達之知，留校任補習班教員，並介充朝陽大學講師開始，先後任國立女子大學教授、北京大學講師。任國立暨南大學教務長時，訂定道德、科學、軍事、政治與職業五種訓練為教學方針。任國立中央大學教育學院院長時，則主張個性、群性、民族性應交互調和發展。以後任國立四川大學師範學院院長、中央幹校研究部教授兼教育組主任、國立政治大學教授，以迄渡海來臺，任教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民國四十四年師大教育研究所成立，遂專門主講於教育研究所，間亦指導政治大學研究生之研究。除作育人才外，更隨時駁斥唯物辯證法與共匪之邪說，以建設人心，端正風氣。

先生倡導人性本位，理性至上，民生中心的教育學說。對於比較倫理學的研究，尤具心得。從生物、心理、社會和文化各方面闡明行為及道德的演進，詮次眾說，獨倡「和協之人生」，由心身、社會、國家、民族，以至世界人類和宇宙萬物，認定助漸易爭，同復容異，致人生之中和，達宇宙之太和。先生著述，除出版有比較倫理學、教育哲學、中國哲學通論、中國哲學史（上卷）、殷周教育制度及其社會背景、荀子名理與蓋然論等之外，其餘論文講辭等四十篇約三十餘萬言，由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全體學生趁先生七秩大壽的機會，於民國四十八年元月刊印為「文教與哲學」，以為祝嘏。希

望「使不知道黃先生的人，能認識黃先生對社會所作的貢獻並承認其價值，而已認識黃先生的人能更進一步地了解黃先生，使我們今日的社會能向更高一層的境界去發展」。（見「文教與哲學」獻詞）至於教育、文化和哲學以外的文章，先生在「文教與哲學」後序中說：「歸國前後未刊之散文、韻文，亦已哀然成帙，或將時有增益，擬名『詩文存』而冠以吾號，十年後再行未晚也。」可惜天不假年，遽於四十八年九月十八日逝世於臺大附屬醫院。稟命不融，微言圯絕，豈僅學生痛失良師，整個國家和社會都哀悼哲人其萎啊！

先生狀貌溫順，志意純潔，平日布衣蔬食，刻苦自勵，從來沒有疾言厲色，可是同學們都由衷地敬愛著先生。特別是冬天，先生在一襲長袍外面，加上一件比長袍短一截的厚大衣，坐在研究所教室裏，諄諄講論，不由得從心底感到溫暖。我想古代的「如坐春風」和「如沐化雨」，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我第一次接受先生的教誨，是在民國四十一年。那時候是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教育系四年級，先生講授教育哲學。可能是全班人數眾多，先生的聲音比較小，所以當時的印象，是先生的講述沒有其所著述的講義精采。後來在民國四十四年考入教育研究所，朝夕受到先生的教誨和指導，對先生淵博的學識和平易的風範，得以親近受益，對先生不阿不苟的態度和不厭不倦的精神，也幸能體認和受到薰陶。

先生最偉大和最令人敬佩的是「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先生早年從大儒陳介石習經史，復留

學英國劍橋大學和愛丁堡大學學習教育、倫理和哲學，可謂學貫中西；而且當年師大教育研究所主任田師伯蒼深以得先生與陳康先生分任中西哲學史的講席而自豪，但先生從未一天稍停研究。每次去看先生，都是看到一卷書，一枝毛筆，正襟危坐，伏案批閱。先生的著述之多，實在與他的好學有關。先生在其七十述懷中還說：「我今年七十，半鬢鬢始蒼。著書雖矻矻，多未竟篇章。茲唯日不足，務廣更契違。年若如礪叟，無待我鷹揚；年若如伏勝，傳經或可方。」可見先生的好學不厭。

先生教學，諄諄善誘，數十年如一日。記得在教育研究所時候，先生授中國哲學史、中國固有教育制度以及程朱、陸王、顏李教育思想等課，往往一連三四節課不休息。我們年輕人坐著已經感到吃不消，先生以七十高齡，卻仍然精神奕奕，津津而道，毫無倦容，使我們真是慚愧，亦使我們敬佩不已。我們第一屆研究所同學五人，其中四個人的畢業論文是先生指導；同時，先生因兼授政治大學研究生課程，亦有兩位同學的論文需要先生指導。從搜集資料、擬訂大綱、編定章節，到潤飾文字，先生無不認真指導，取捨斟酌，一絲不苟；雖然勞累，亦沒有一點煩倦之心。孔子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子貢說：「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以先生的學不厭和教不倦的精神而言，則先生已經做到了「仁且智」的「聖」的地步了。

民國五十一年教師節，我在「新天地」月刊曾經發表「懷黃建中師」以紀念先生的逝世三週年，文中有這樣一段話說：

三年來，無時不在懷念著先生。每次經過先生以前的宿舍，我會憶起向先生請益的情景；平常為學生講課，也會記起先生為自己授課的神情；要是介紹到先生的著述，更是黯然不已。每年還有兩件使我特別懷念先生的事情，一件是學校召開系務會議，一件是申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會的擬訂計劃。先生逝世後，教育部為了紀念先生，特在師範大學教育系設立「黃建中先生獎學金」一名，每次在系務會議審查學生成績和討論的時候，我就覺得先生像以前一樣，慈祥的坐在會議席上，可是等我定神找尋時，又那裏有先生呢？

每年暑假以前，申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會補助的計劃大綱擬訂好了，我都會拿起計劃，去找先生，想請他給我指導，就像指導我在教育研究所寫畢業論文時一樣，可是想起先生已經仙逝而去，再亦沒有一位如此剴切可親地指教的人，我只能頹然感嘆，我已經痛失良師！

先生之所以如此令人懷念，除了先生的學不厭和教不倦的精神之外，主要是能夠給予學生以深遠的影響和重大的啟示。以我個人而言，在還沒有進入師大教育研究所之前，對於教育只能說有研究的興趣，而缺乏研究的方向；有研究的計劃，而又失諸空泛，當然更談不上研究的途徑和方法。待進了研究所，受所主任田先生以及各教授的指導，始漸能略窺門徑，其中又以受先生之教和得先生之益為最多。先生對中國哲學和教育思想，獨具心得，所以我們同學隨侍左右，所受薰陶亦深。四年之間，先後有二程教育思想、朱子教育思想、陸象山教育思想、陽明教育思想、伊川教育思想、顏習齋教育思想、顧亭林教育思想及張載教育思想等屬於教育思想，以及中國書院教育新論、唐代科舉考試制度

、漢代之太學及中國固有大學教育之演進等屬於教育制度的論文之作；正如先生所說，這些論文：「雖未能遽入學術著作之林，亦差堪備長編劄記之選。」由於先生的影響，把研究的方向，朝著中國固有教育的發展做去，不僅是我個人，可以說大多數早期師大教育研究所的同學，都是受先生之益；甚至整個師大教育研究所之希望在中國教育方面，能夠提供有系統、有價值的貢獻，亦都該感謝先生的指導。

先生對於研究中國教育之發展，認為不外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兩方面，一事一理，相互表裏，均以社會文化為背景，而彼此又交互影響。有時教育制度引起教育思想，理不離乎事；有時教育思想創發教育制度，事不離乎理。二者合而治之，事理固可兼賅；分而治之，理事亦得互證。專治教育制度，當事詳於理，專治教育思想，則當理詳於事，而社會文化背景均不可忽。先分治，後合治，則一面博徵其事，一面詳說其理；融會貫通，終歸於約，庶幾「博而不雜，約而不漏」。（見師大教育研究所集刊第二輯弁言）先生在中國哲學之研究途徑方面，主張初步研究在求詰義、定界說；系統研究分縱系與橫系；專精研究則有斷代、專書、專題、某家哲學、某派哲學與某人哲學之研究；以及比較研究之有縱比、橫比、同比、異比與同異交比。（見師大教育研究所集刊第一輯）在中國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方面，亦列舉詳細內容，以期深考和窮究這些事理的興廢利病和是非得失。甚至在研究中取材撰文的標準，亦能不厭其詳的臚舉說：

「第一，材料務以原始者為依據，以轉手者供參考，所謂譬如鑄錢，采銅於山，上也；購銅

於市，次也；買舊錢，用廢銅，斯為下矣。

第二，材料須鑑別真偽，按時代分先後，所以事果有，理果是，不以書之偽而斷其無；書果真，不曲解其文，殺亂其事與理。

第三，材料須決定取捨，依內容分門類。所謂記事提其要，纂言鉤其玄；材料當捨者則割愛，可取者則類輯。纂類策括，固未可言學問；但純依原書內容，從客觀方面分別部居，不先從主觀立意以求，亦未足為病。至徒取材於類書，則偷惰者所為，不但不足取，而且是可鄙的行為。

第四，了解先於批評，判斷須有論證。對於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須先有體驗和同情之了解，然後能作洞中肯綮之批評。有判斷而無論證，則是武斷；有論證而無判斷，則為戲論。證必求其堅確，斷必期其審慎；論證如未達於十分之見，則判斷寧以蓋然模式出之，毋作必然語氣。」

（見師大教育研究所集刊第二輯弁言。）

這些研究的準則、態度以及途徑與內容，都是先生對後學的教導。對於中國教育的發展之研究，先生曾說：「當由若干承學之士，分工合作，積年完成，豈徒期諸一手一足之烈，一朝一夕之功哉？」同時還說：「昔朱文公自註四書，自作詩傳、易本義，復面授作書傳，分授作禮經疏義；其弟子蔡忱黃榦等皆有所成就。自惟學行無似，曷敢望先賢；然後生可畏，安知無出藍而勝焉者，甚將旦暮遇之耶？」對於學生們寄以莫大的厚望。

我在「懷黃建中師」短文中曾經說：「如今，同學中有的遠在海外，有的忙於行政工作，能夠承

先生遺志，繼續研究的僅存數人，我想如果稍假時日，能把各人所彙集資料，所獲心得，彙成『中國教育思想史』或『中國大教育家』，用來紀念先生教育之恩，當會更有意義。」可惜歲月逝去者又已十年，終未實現。所幸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出刊「師道」，為中外大教育家長留典範，而黃先生的治學、教人，不僅是直接受教的學生們需要繼承遺志，繼續努力，而且是所有從事教育工作的，以及將來願意獻身教育事業的朋友們，所應效法的。